

基于“政社村共同体”视角的产业—人才—文化—组织耦合发展的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王妙妙^{1,2} 姚军^{1,2}

1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广东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中心

摘要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涵盖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维度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在系统思维指导下统筹推进。然而，当前实践多聚焦于单一维度的发展，忽视了各要素间复杂的互动与耦合关系，导致振兴效能受限。本文基于“政社村共同体”的理论视角，以广东省实践为考察重点，构建了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维耦合”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产业动能、人才支撑、文化赋能与组织保障四个系统在政府、社会资本与村集体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共同体”场域中，通过物质、能量与信息持续交换，实现动态平衡与协同演进的过程。这种耦合关系呈现为递进式的三重境界，即从初期的“物理叠加”阶段，经由“化学键合”的过渡，最终迈向“生物共生”的成熟形态。同时，基于广东相关典型案例，揭示了当前耦合发展在顶层设计、利益联结、要素流动与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的深层阻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条以此为核心理念的系统性振兴路径，旨在将外部资源的注入有效转化为乡村内生的、可持续的发展能力。

关键词 政社村共同体；产业振兴；耦合发展；乡村振兴路径；多元共治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104>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6.0801.39-50

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经过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6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与长效机制研究——以广东省为例”（项目编号：GD23XGL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妙妙，女，1985 年 2 月出生，甘肃天水人，广东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博士后，从事产业发展与政策、乡村振兴研究。姚军，男，1973 年 10 月出生，河南信阳人，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教授，从事城乡治理研究。

© The Author(s) 2026. CC BY-NC-ND 4.0.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3 November 2025; Accepted: 1 December 2025; Published: 15 January 2026.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ISSN 2664-1127 (Print), ISSN 2664-1720 (Online), ISSN 2664-1747 (CD-ROM). Published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开元出版有限公司 (CPCL®). 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 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有限公司进口. Email: cpcl@cpcl.hk, <https://ssci.cc>, <https://cpcl.hk>.

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央明确指出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这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已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针，深化为“五个振兴”的系统工程，体现了对乡村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升华。

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维度相互关联、互为支撑。其中，产业振兴是物质基础和核心引擎，人才振兴是关键支撑，文化振兴是精神灵魂，生态振兴是发展底色，组织振兴是保障引领^[1]。从系统动力学视角看，这五大动力与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存在着深刻的耦合关系，其协同演进构成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机理。“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只有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才能激活乡村内生活力，实现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能的根本转变。然而，在如火如荼的实践中，不少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时，往往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要素割裂困境。产业项目孤立上马，却因缺乏本土人才运营而难以为继；文化资源被仓促开发，却因与现代市场、社区组织脱节而沦为“盆景”；社会组织与资本下乡，却因与乡村原有治理结构、文化网络“水土不服”而产生摩擦。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未能深刻认识到乡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巨系统，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等要素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耦合关系。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来看，乡村发展系统由多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决定了系统演化的方向与效能^[2]。只有当各要素形成良性互动、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才能真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的耦合并非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治理场域与关系结构中孕育、演进。这一场域的核心，正是“政社村共同体”，一个由政府（“政”）、社会资本与各类社会组织（“社”）、村集体与村民（“村”）三者基于共同目标、共享规则、共担责任、互利共赢原则结成的治理与发展联盟。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把组织振兴摆在首位，靠组织振兴统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只有农民改变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获得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利益回报，才能形成产业振兴的强大内生动力。因此，探究“政社村共同体”何以成为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维耦合的“容器”与“反应炉”，揭示其内在机理与演进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立足于广东省的丰富实践，以“政社村共同体”为理论视角，系统构建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维耦合”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耦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演进阶段与实践阻滞，进而探索以共同体建设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系统性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乡村振兴系统性、复杂性的理论认识，也为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一、文献综述

将源自系统科学的“耦合”概念引入乡村产业振兴研究，旨在超越对单一要素的线性分析，转而聚焦于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等关键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互动关系及其整体涌现效应。产业振兴并非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以产业为牵引，带动适配的新型职业农民、返乡创业者、专业技术工作者等现代人才的集聚与成长。产业过程与文化遗产、活化、创新相互渗透，形成独具魅力的乡村品牌与产品故事，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高效、包容、具有动员能力的基层组织与治理体系作为支撑和保障。同时，人才的活力能激发产业创新，文化的自信能提升产业价值，组织的效能可优化产业环境，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动态平衡、协同演进的乡村发展生态系统。近年来，学界日益关注多要素协同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围绕“政社村共同体”构建与“产业—人才—文化—组织耦合”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理论构建

乡村振兴的本质在于对村庄作为生产、生活和治理共同体的再造与重塑^[3,4]。“政社村共同体”强调

政府、社会资本与村集体、村民基于共同目标与共享规则形成的治理联盟，其构建是产业等要素实现深度融合的“容器”与“反应炉”^[5-8]。在此框架下，学界对产业与其他要素的“耦合”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在产业与组织耦合方面，揭示了从依赖外部项目嵌入向激活内部社会网络转型的新趋势^[9]，并提出了“村社经营统合体”^[10]“统合式经营”^[11]等概念，强调党组织引领下的村社集体在整合多元利益、实现经营再生产中的核心枢纽作用^[12]。在产业与人才耦合方面，强调人才是整合资源、传承文化、创新产业的系统能力载体，需构建产业链、人才链、服务链协同的培育体系^[13,14]。在产业与文化耦合方面，主张文化价值应与产业生态深度融合，通过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实现乡土文化基因的唤醒、再造与产业转化^[15]。

（二）实践困境

尽管理论倡导协同，但实践普遍面临要素割裂与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16,17]。大量研究指出，当前许多乡村发展项目仍呈现“项目制”的单点思维，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等政策资源分散，缺乏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导致发展效能受限，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未能有效激发内生动力^[18]。首先，利益联结松散脆弱^[19]。外来产业与村庄的互动可能呈现“产业吞并村庄”或“悬浮而不生根”的结果，村集体与农民难以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耦合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其次，要素流动存在梗阻^[22]。外部人才、资本、技术可能因与乡土社会网络、地方性知识脱节而处于“悬浮”状态；同时，本土人才与文化价值的对外通道不畅，导致“耦合”过程中的“排异反应”。最后，组织能力存在赤字^[20]。部分乡村基层组织面临“能力赤字”，难以担当资源整合者和市场谈判者的关键角色。

（三）走向协同共生的机制创新的路径探索

在治理机制上，强调强化基层党组织“元治理”功能，通过搭建平台、设计规则，特别是“产权—利益—情感”三重联结制度来统筹协同发展^[21,22]。在主体赋能上，主张对外部社会资本进行“引导性赋能”，促使其向“共建者”转变^[23,24]；对内则重点培育“乡村CEO”与本土经理人队伍，强化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化运营能力^[25,26]。在发展范式上，提出了“新内生发展”理念，倡导立足乡村整体价值，统筹本地资源禀赋，推动产业、生计、文化等关键要素的整合^[2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清晰指出乡村产业振兴必须走多要素协同的系统之路，并在共同体构建、耦合机理与个案实践上积累了宝贵成果。然而，仍有三方面可供进一步深化研究，其一，多数研究侧重于分析两到三个要素的互动，对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维”如何在同一实践场域中产生化学反应、实现“生物共生”的系统性机理，尚缺乏完整的理论模型建构。其二，对“政社村共同体”这一耦合场域内部动态的权力关系、协商过程与共识达成机制，微观层面的实证剖析仍显不足。其三，对于如何将上述理论机制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综合性政策工具包，研究仍较为零散。基于此，本研究在“政社村共同体”的多元共治框架下，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大要素如何实现有效耦合，从而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这一耦合演进的内在逻辑与阶段性特征是什么？基于此，如何构建一个可操作、可推广的系统性振兴路径？在实践上，以民营经济发达、城乡融合探索前沿的广东省为主要观察对象，其“万企帮万村”升级为“万企兴万村”等丰富实践为研究提供了鲜活样本，旨在为政府优化政策设计、为社会资本深度且可持续地参与乡村振兴、为乡村社区激活内生动力，提供兼具前瞻性与操作性的路径参考，助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提供广东乡村路径。

二、“政社村共同体”：耦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场域构建

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的耦合并非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治理场域与关系结构中孕育、演进。“政社村共同体”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治理场域，超越了传统的“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村庄配合”的线性思维，构建了一个政府（“政”）、社会资本与各类社会组织（“社”）、村集体与村民（“村”）三者基于共同目标、共享规则、共担责任、互利共赢原则结成的治理与发展联盟。这一场域并非静止的制

度框架，而是一个动态的“容器”与“反应炉”，即在文化底层基因（地方性知识、集体记忆、价值认同）的深层浸润下，三元行动主体依托制度化的协商议事平台持续互动，共同产出治理原则。这些原则进一步转化为制度环境供给、资源整合交换、矛盾化解与共识达成三大核心功能，从而为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的“四维耦合”系统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框架、资源平台与协调机制。与此同时，耦合系统的实践经验通过典型案例的模式提炼与制度创新，不断向上反馈至共同体场域，推动其持续优化与演进。正是通过这种“文化浸润主体—协商产出原则—功能支撑耦合—实践反哺理论”的动态闭环与双向互构，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个关键发展要素得以在共同体的孕育和催化下，发生深刻的相互作用与融合（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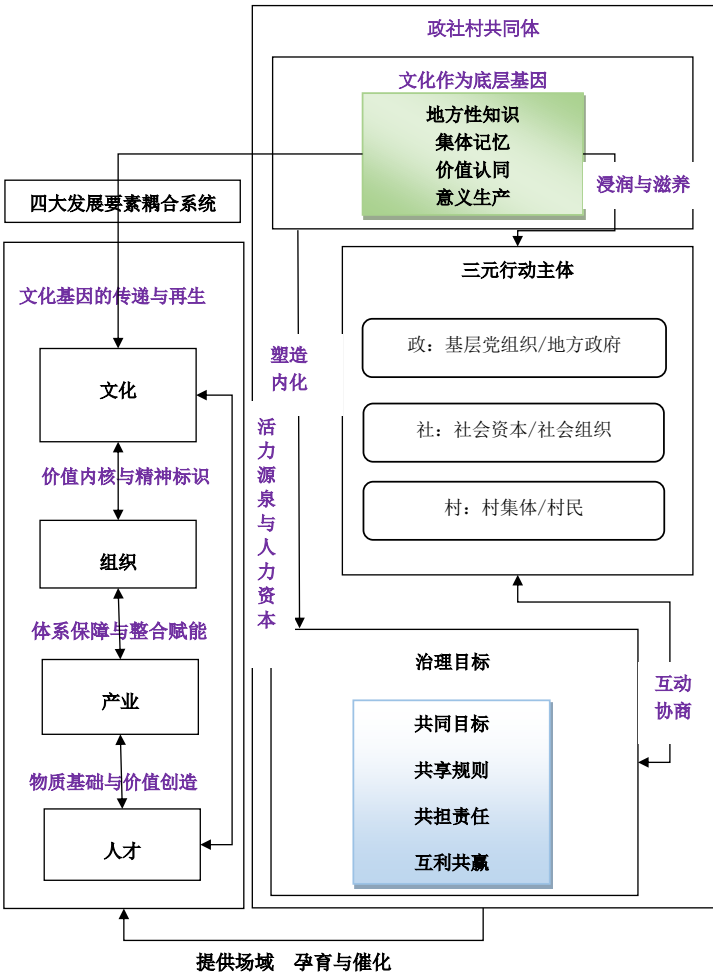


图 1：“政社村共同体”核心治理场域关系图

首先，“政社村共同体”为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的耦合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与初始动能。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元治理”角色，其核心职能并非大包大揽，而是通过制度供给、平台搭建和利益协调，为耦合创造初始条件。例如，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产业项目落地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如强村公司、持股平台）的诞生扫清产权障碍；通过出台人才引进与培育政策，为乡村产业注入第一波“新鲜血液”；通过购买服务、资源链接，引导社会资本与文化力量有序进入。如广东南雄市在丝苗米产业发展中，以制度创新构建“社村耦合场域”，通过“联合会—平台—公司”三重架构重塑丝苗米产业治理，政府牵头成立社村联合会，吸纳龙头企业、金融机构、村集体、种植大户、烘干中心、农机合作社等 59 个会员组成产业链主体，以积分制决策实现多元协同；南雄全市 208 个村集体将可经营性资产（土地经营权、闲置仓库、扶贫车间）折股注入“南雄市万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形成联合持股体，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再与广东天禾农资（省属上市供销企业）合资设立社村公司，村集体占股 30% 并享重大事项否决权，实现“政企

分离、资本合营”，通过“阶梯租金+二次分红”“服务积分兑价”“品牌溢价返还”三重机制，使村集体和农户共享增值收益，试点村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70%以上，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范式。

其次，“政社村共同体”是多元资源整合与交换的枢纽。社会资本（企业、商协会）带来市场嗅觉、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村集体和村民则提供土地、劳动力、地方性知识和深厚的社区网络。二者的对接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在共同体框架下的深度嵌合。例如，广州番禺区的“百企兴百村”行动，引导企业与村社结对，不仅投资产业，还共办社会事业、共建基础设施、共育文明乡风，实现了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在共同体内部的循环与增值。肇庆封开县以县域供销服务中心为枢纽，将县镇村三级股权联动的农业服务平台与村集体对接，形成“服务中心+村社+农户”的托管共同体，市供销合作社以“县域服务平台+乡镇实体服务站+村助力+农户”为运营架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联动机制，通过市场化运营、规范化管理、标准化服务赋能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共同体内部的同步增值。

最后，“政社村共同体”是化解冲突、达成共识、生成社会资本的关键机制。产业导入可能冲击传统生计，外来人才可能遭遇文化隔阂，资本逻辑可能与乡土伦理产生摩擦。共同体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制度化的协商议事平台（如党建联席会、村民议事会、甘棠议事、板凳议事、凉亭夜话等），通过反复沟通、利益博弈与情感交融，将潜在的矛盾转化为新的合作规则与社区共识。这个过程本身就在生产宝贵的“社会资本”，即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这些是耦合关系得以深化的“润滑剂”和“黏合剂”。例如，广东省开平市塘口镇建立“社区党支部+新乡人理事会+旅乡人志愿队”协商平台，将外来经营者纳入网格共治，实现“新老居民”共建共享，通过空间、产业、文化与治理的系统耦合，塘口镇让文明乡风成为可经营的“软资产”，成功破解人口倒结构下的公共服务与秩序难题，是共同体机制化解复杂矛盾的生动体现。

三、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维耦合”的内在机理与演进特征

在“政社村共同体”构成的协同治理场域中，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个子系统并非独立变量或简单并列，而是构成了一个以产业振兴为价值实现终端、以组织振兴为制度供给与行动框架、以人才振兴为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载体、以文化振兴为社会资本与意义生产源泉的复杂适应系统。四者通过物质、信息与能量的持续交换，形成了一种动态、互构、共演的网络关系。其耦合过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呈现出一个从低阶关联向高阶共生演进的螺旋式路径，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跃迁机制。

（一）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维耦合”的内生动力与互动机制

1. 产业与人才的耦合：价值创造循环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协同演进

新兴产业或升级后的传统产业（如智慧农业、农文旅融合、农产品精深加工、农村电商等），重塑乡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侧，创造出一系列具有更高技术含量、创新性与附加值的新岗位，对外部专业人才产生“虹吸效应”，更关键的是对本土人力资本形成了“诱导性投资”与“涵养机制”，通过“干中学”、定向培训与价值链攀升，推动在地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者向技能型、管理型乃至创业型“新农人”转变。反之，人力资本的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通过知识溢出、技术采纳与管理创新，直接赋能产业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产品服务差异化以及市场边界拓展，从而形成“产业升级诱导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增值驱动产业深化”的闭合正反馈循环。例如，广东番禺新水坑村在结对企业的技术与资金支持下，推动惠民项目落地，其集体经济实现显著增长，这一实践表明，外部技术与资金的注入若能与在地人才的系统性培育相结合，其引发的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是社区内生发展能力的结构性跃迁。

2. 产业与文化的耦合：符号价值生产与地方性知识的资本化转换

产业与文化的耦合本质上是经济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创造性融合。乡村产业，特别是基于地域特色的农产品与文旅产业，其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日益取决于能否将独特的地方性知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与集体记忆符号，有效地编码为产品与服务的独特“符号价值”。这一过程是通过创意设计、叙事建构与体验

场景营造，完成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的象征性转换。例如，广州花都塱头村的“春阳台”艺文中心，以极具现代张力的建筑形态深度植根于古村肌理，将“古建新生”与“文化传承”这一非物质过程进行了极具实验性的空间转译与业态重构。通过策划引入当代艺术展览、常设地方文献馆藏、举办文化沙龙及文创工作坊，成功地将“静态的乡土历史”（如塱头村 800 余年的广府文化）转化为一系列可参观、可研习、可消费的“动态文化体验”，如高品质的美术馆游、专题展览衍生品开发及本土风物手作工坊，超越了传统文旅对文化元素的简单拼贴，构建了“文化策展驱动、空间场景叙事、高端业态集聚”的深度价值实现路径，有效激活了古村落整体向一个融合艺术、旅游与社区生活的复合型文化目的地转型。反之，产业成功带来的经济收益与市场关注，为文化遗产的保育、活态传承与创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与现代性语境，吸引新一代传承人，使文化传统在适应现代审美与需求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文化资源赋能产业差异化—产业收益反哺文化再生产”的互惠共生路径。

3. 组织与产业、人才、文化的耦合：治理体系的元功能与系统整合

乡村基层组织（包括村党组织、具备市场法人地位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各类专业合作社与社会组织）在此耦合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元治理”角色。它并非耦合的普通要素，而是耦合过程的架构者、赋能者与调节器。其核心功能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资源整合者。通过制度创新（如南雄市成立“社村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打破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碎片化状态，进行战略性重组与定向投入，为耦合提供初始动能和物质基础。二是利益协调者。通过构建“保底收益+股份分红+劳务报酬”等复合型利益联结机制，在资本、集体与农户之间建立稳固的契约纽带，将潜在的社会冲突转化为激励相容的合作秩序，这是耦合系统得以稳定的社会基础。三是服务提供者。为人才创业提供孵化空间，为文化活动提供传承场域，为产业发展对接金融、技术等关键服务，降低各子系统运行与互动的交易成本。四是发展秩序的维护者。运用村规民约、民主协商等柔性治理工具，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增长与长期可持续性、外来引入与本土存续之间的张力，为耦合演进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和纠偏机制。

（二）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维耦合”发展的三重演进特征

产业、人才、文化与组织的耦合，并非一蹴而就的静态结果，而是遵循系统演化逻辑、具有清晰阶段性特征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可被概念化为从低阶“物理叠加”，经由中阶“化学键合”，最终迈向高阶“生物共生”的连续谱系。每一重演进特征，都标志着系统在结构复杂度、内在关联度与内生动力强度上的质变（见表 1）。

表 1: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组织耦合发展的三重演进特征

演进阶段	核心特征	互动模式	内在动力
低阶形态： 物理叠加	要素机械并置，外部主导，项目制引入	缺乏深层价值交换，依赖外部资源持续注入，容易脱嵌成为“飞地”	外部“输血式”驱动，内生动力微弱
中阶形态： 化学键合	建立制度键合，产业根植转化本地资源，内外互动深化	文化融入产业叙事，村集体实质参与，但结构脆弱且过于依赖关键个体	内外部能力互构，内生动能初步显现
高阶形态： 生物共生	边界模糊，系统具备自组织、自我修复与自演进能力	产业网络化支撑，人才梯队健全，文化升华精神认同，党建引领高效治理	深度融合驱动，内生动能强大且可持续

1. “物理叠加”构成了耦合的初级形态，其核心特征是要素的机械并置与外部主导

在此阶段，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等要素以项目制方式被引入乡村空间，它们之间呈现松散、临时

的功能性关联。例如，一个外部投资的加工厂（产业）与短期派驻的技术员（人才）、作为宣传口号的乡土符号（文化）以及被动执行协议的村委会（组织）之间，缺乏基于地方知识的深度互动与价值交换。这种耦合本质上是“输血式”的，要素间“化学反应”微弱，系统稳定性高度依赖外部资源持续注入。其风险在于严重的“悬浮性”，项目易与社区社会网络脱嵌成为“飞地”，人才如“候鸟”般流动，文化被简化为肤浅的装饰。一旦外部支持撤离，发展进程便可能中断，难以在本地留下可持续的能力积淀。

2. 当耦合演进至“化学键合”阶段，系统开始出现结构性的深刻转型与内生动力的初步萌发

各要素之间通过关键性的“制度键合点”建立起稳定、互赖的结构性联系。产业开始主动根植并转化本地特色资源（如特色农产品、生态景观），并在此过程中催生出本土化的新型经营主体与“乡村 CEO”；文化不再仅是符号，而被深入挖掘并融入产品叙事、品牌建构与体验设计，成为价值增值的核心来源；村集体则通过产权入股、合作经营等机制，从旁观者转变为拥有实质性决策参与和利益分享的“共同经营者”。这一阶段的耦合，标志着发展逻辑从“外部植入”向“内生培育”的转向。然而，其耦合结构尚存非均衡性与脆弱性，发展可能过度依赖单一产业或关键个人，各子系统间的互动深度与广度不均，利益联结机制的长效性与公平性仍需经受考验，系统的抗风险能力有待加强。

3. 耦合发展的理想高阶形态是“生物共生”

在此阶段，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大要素的边界趋于模糊，深度融合为一个具有自组织、自适应与自演进能力的“乡村生命共同体”。产业生态呈现多元化、网络化支撑（如农文旅教深度融合）；人才结构形成涵盖领军者、专业人才与本土工匠的有机梯队，具备内部培育与迭代能力；文化升华驱动整体系统价值创造、凝聚社区认同的核心精神 IP 与意义源泉；而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政社村共同体”则高度成熟，展现出卓越的协同治理、动态调适与持续创新能力。系统如同生命体，能够在内外扰动中实现自我修复、学习与进化。达到这一境界的乡村，具备强大的内生韧性与创新活力。当然，维持此种高阶动态平衡对制度环境的敏锐性、对路径依赖的警惕性提出了极高要求。当前广东乃至全国的许多成功实践，大多正处在从“物理叠加”向“化学键合”跃迁的关键期，少数先进案例呈现出“生物共生”的雏形。推动耦合境界的升级，是提升乡村产业振兴质量和可持续性的核心任务。

四、当前“四维耦合”发展的现实阻滞与结构性张力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维耦合”的宏大愿景在实践中遭遇了深刻的现实困境，这些阻滞并非孤立的运行障碍，而是根植于既有制度安排、治理结构与市场逻辑的系统性“结构性张力”，共同构成了耦合从理想模型迈向实践深化必须逾越的鸿沟。

（一）顶层设计的系统割裂与治理理性的路径依赖

当前，推动耦合的最大制度性障碍在于顶层设计的碎片化与治理思维的路径依赖。许多地方的乡村振兴规划仍未摆脱“项目制”的窠臼与单一的经济增长偏好，呈现出显著的“部门化”特征，即产业规划由农业农村部门主导，文化振兴由文旅部门部署，组织建设与人才工作则分属组织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这种基于专业分工的“条块分割”式政策供给，导致了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四大要素在政策源头上便被预设为平行甚至割裂的轨道。其后果是政策资源难以在乡村场域实现协同整合，反而可能因目标冲突而相互抵消，例如，追求短期 GDP 的产业扩张用地可能侵蚀承载文化记忆的公共空间；脱离地方产业实际的人才补贴可能引致资源错配。更深层的挑战是一种治理理性的“路径依赖”，决策者习惯于运用工业化、城镇化的线性扩张逻辑来应对乡村这一复杂适应系统，难以真正理解和采纳生态化、网络化与融合共生的新范式，导致顶层设计在理念层面便与产业、人才、文化、组织“耦合”的内在要求相龃龉。

（二）利益联结的契约脆弱与增值分配的伦理困境

产业、人才、文化、组织耦合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在于能否构建稳定、公平且激励相容的利益联

结机制。然而,实践中的普遍困境是利益联结的契约化程度低与分配结构的严重失衡。大量所谓的“村企合作”仍停留在以固定租金、临时性劳务雇佣为主的初级交易阶段,村集体与农户被置于产业链的末端,无法参与品牌溢价、加工增值、渠道利润等核心价值的分享。这种“有连接、无共享”的脆弱联结,使乡村主体无法建立起对产业发展的长期稳定预期,其参与的主动性与责任感被严重削弱。当市场风险来临,此类联结极易断裂。例如,广东南雄丝苗米产业探索的利润分层返还机制,是对此困境的突破性尝试,但其可持续性与在不同产权结构、产业类型中的可复制性,仍面临严峻考验。这背后是一个深刻的分配伦理与治理技术难题,即如何在资本逻辑、集体利益与农户生计之间,设计出兼具公平、效率与法律保障的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方案。

(三) 要素流动的结构性梗阻与本土知识的价值悬置

耦合要求产业、人才、文化等要素在城乡间、系统内实现双向、有机的流动与融合。现实却呈现出严重的结构性不对称与“本土性”脱嵌。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人才、资本、技术从城市到乡村的“单向输入”,且这种输入往往以“项目包”“技术包”等标准化、去情境化的形式呈现,难以与乡村特定的社会网络、地方性知识及非正式制度相融合,从而陷入“悬浮式嵌入”的窘境。外来管理者不解“村情”,高新技术难以适配小农生产的复杂场景,文化创意产品因缺乏真正的乡土灵魂而无法获得村民与市场的认同。与此同时,乡村内部孕育的本土知识、技艺、人力资本与生态价值,其向外部市场“输送”并实现公允定价的通道却异常狭窄。这种双向流动的不畅,导致了耦合过程中的系统性“排异反应”和“内耗”,外部要素难以扎根,内部价值无法彰显,系统在内外张力的拉扯中消耗内生动力。

(四) 组织载体的能力赤字与角色认同的内在冲突

“政社村共同体”的有效运转,最终依赖于一个有能力、有权威、有信誉的在地组织载体,通常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新型合作组织。然而,普遍存在的“组织能力赤字”构成了耦合发展的操作层面瓶颈。这类组织往往严重缺乏具备现代市场洞察、商业谈判、资本运营与风险管理能力的带头人,其内部治理、财务管理和战略规划能力薄弱,难以胜任资源整合者、市场谈判者与利益协调者的关键角色,更为复杂的是基层组织面临的“角色混同”与“合法性”张力。村两委及集体经济组织通常需要同时扮演多重角色——向上负责的“行政代理人”、集体资产的“政治监护人”、社区公共利益的“服务提供者”以及参与市场竞争的“风险承担者”。这些角色内在的权责逻辑与目标函数存在冲突,如行政任务优先导向与市场机遇捕捉导向之间的矛盾,导致组织行为陷入目标模糊、激励错配的困境,难以聚焦于引领村庄的长期系统性发展。培育一个既具备现代企业能力又深度嵌入乡土社会、既能对接市场又能凝聚社区的复合型本土运营组织,是构建坚韧共同体的核心挑战,也是当前最为突出的短板。

综上所述,这四重阻滞相互关联、彼此强化,共同形塑了乡村产业振兴从“简单要素堆积”迈向“复杂系统耦合”所必须穿越的“转型峡谷”。破解这些阻滞,需要的是从理念、制度到技术的系统性革新。

五、迈向“生物共生”: 基于“政社村共同体”的四维耦合振兴路径

为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组织耦合从“化学键合”向“生物共生”的高级形态演进,须实施一套系统性的干预策略,以“政社村共同体”为轴心,围绕“制度创新—主体赋能—平台运营—数字融合”四个关键环节展开。

(一) 核心机制: 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制度化耦合设计框架”

强化基层党组织在耦合发展中的“统筹协调”功能,推动组织振兴,其关键不在于直接经营,而在于“搭台、定规、护航”。一是搭平台。由县乡党委牵头,成立跨部门的“乡村融合发展委员会”,吸收企业、商会、乡贤、村民代表参与,负责制定本区域产业、人才、文化、组织耦合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行动路线图,统筹配置各类资源,破解部门分割。二是定规则。核心是设计并推行“产权—利益—情感”三重联结制度。

在产权联结方面,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通过土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资产入股等方式,让村集体和农民成为产业链上的产权所有者。在利益联结方面,在合作契约中明确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利润返还、就业保障等多元化利益分配方案,并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在情感联结方面,建立常态化的社区沟通与文化活动机制,如乡贤议事会、文化工坊、共庆节庆等,促进外来人才与本地村民的相互了解和认同,积累社会资本。同时,基层党组织需扮演“风险缓冲器”和“矛盾化解者”,建立风险共担基金,调解合作纠纷,在市场波动时保障农民基本利益,维护共同体稳定。

(二) 主体赋能: 实施“双向激活”的人才与组织成长计划

一是对外部社会资本的“引导性赋能”。政府不应仅停留在给优惠,更要通过“乡村振兴合伙人”认证;提供含政策解读、本地资源手册、社区对接服务、风险提示等“乡村投资服务包”;组织沉浸式乡村体验营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理解乡村逻辑,尊重乡土主体性,从“投资者”转变为“共建者”。二是对内部主体的“战略性育成”。这是耦合能否内生的关键。首先,培育“乡村CEO”与本土经理人队伍。设立专项基金,选拔本土青年或返乡人才,送往高校、企业进行系统性培养,并辅以实战导师,专门负责村集体资产运营、合作社管理或具体项目执行。其次,强化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化能力。通过引入专业顾问、与成熟企业成立合资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提升其市场决策、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如江苏大泗镇成立专业联村公司并由党员骨干攻坚克难的模式值得借鉴。最后,活化乡土文化传承人,活化乡土文化传承人,资助非遗传承人带徒授艺,支持村民自发成立文化社团、生态保护协会等,赋予其参与产业规划和收益分配的权利,使其成为文化价值生产与维护的主体。

(三) 平台运营: 发展“嵌入式”的产业服务与文化运营平台

“政社村共同体”的四维耦合需要实体支点,因此,应大力扶持和发展两类平台,一类是多功能产业服务综合体。借鉴南雄市“农产品综合服务站”和成都“桃花书院”模式,在乡村建设集农技推广、电商直播、物流仓储、品牌展示、游客服务、创业孵化、社区活动于一体的物理空间。这个空间由政社村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同受益,自然成为产业、人才、文化、组织交汇融合的“节点”。另一类是品牌化文化价值运营平台。围绕区域公共品牌,组建由企业、村集体、农户、设计师、文化学者共同参与的产业联盟。该平台不仅负责制定标准、营销推广,更核心的任务是持续挖掘和创作品牌背后的文化故事,策划文化体验活动,将文化叙事深度植入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实现文化价值的持续转化。

(四) 数字融合: 以数字技术重塑耦合的广度、深度与效率

数字技术是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提升耦合能级的革命性工具。一是建设“乡村数字孪生底座”。利用GIS、物联网等技术,对乡村的土地、资产、生态、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测绘与存档,形成可视化的“资源一张图”,为精准招商、项目规划和资源管理提供支撑。二是发展“智慧耦合服务平台”。开发手机应用或小程序,实现土地流转信息发布、人才需求对接、小额金融信贷申请、农产品溯源、文化活动预约、村民议事投票等功能的线上化、智能化。这能极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要素匹配效率,并让更多村民尤其是青年便捷地参与到共同体事务中。三是创新“数字文化传播与消费模式”。通过短视频、直播、VR/AR等方式,生动呈现乡村的生产过程、工艺技艺和生活方式,吸引远程关注和消费。打造“云村民”社群,让数字空间的关注与认同,转化为线下旅游、产品订购和投资合作的现实动力。

六、结论与展望

乡村的全面振兴,绝非单一经济的突围,而是一场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在“政社村共同体”的熔炉中,经历碰撞、交融、重塑,最终走向“生物共生”的系统性变革。本文构建的“四维耦合”分析框架,揭示了这一复杂过程的内在机理与演进逻辑。研究表明,成功的乡村产业振兴,必须摒弃割裂的、项目化的旧思维,转而采用系统的、生态化的新范式,致力于精心培育和维护一个能让各要素良性互动、协同演

进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系统。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构建“政社村共同体”、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方面已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从“百企兴百村”到“百会进百村”,其经验的核心价值在于初步验证了多元共治、合作共赢这一方向的可行性。然而,从“化学键合”到“生物共生”的跃升,仍面临顶层设计系统性不足、利益联结脆弱、要素流动梗阻、组织能力欠缺等深层挑战。为此,本文提出的振兴路径强调,未来工作的重心应从“引进单个项目”转向“营建耦合生态”。这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扮演更精巧的“制度设计师”和“生态园丁”角色,通过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制度化耦合设计框架,实施双向激活的主体赋能计划,发展嵌入式的运营平台,并积极拥抱数字技术,最终将外部的资源与能量,转化为乡村内在的、蓬勃的、可持续的生长力量。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案例追踪比较等研究方法,对城郊融合型、传统农业型、生态保育型等不同类型乡村的耦合模式进行精细化研究,并对“产权—利益—情感”三重联结机制的具体效能进行实证测量与评估,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宝库。

参考文献

- [1] 茅锐, 钱文荣. 城乡共生融合发展: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浙江案例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6.
- [2] Chunlin Xiong, Xirong Zhou, Fen Liu. Evaluation of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village, green agriculture and farmers' well-being in China[J]. Scientific Reports, 2026(16):1-16.
- [3] 熊春文, 肖维娜.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基于对华北一个村庄的案例研究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5):25-38.
- [4] 阳剑兰, 秦行. 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J].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1):12-18.
- [5] 丁胜. 乡村治理中政社互动的实践动向与理论意涵——基于贵州省黔西南州 C 村的考察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10):129-136.
- [6] 付恒阳. 乡村振兴背景下“五社联动”赋能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索 [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6): 328-337.
- [7] 梁琦.“政社共建”下的柔性治理: 乡村振兴政策过程的增权赋能之道——以湖南省宁乡市 D 镇“美丽宜居村庄”项目进村为例 [J]. 地方治理研究, 2023(2):52-64.
- [8] 赵泉民, 井世洁. 利益链接与村庄治理结构重建——基于 N 村“村企社”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个案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5(6):64-74.
- [9] 臧雷振, 刘超. 科技特派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的嵌入式发展路径探索——多案例比较分析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11):115-122.
- [10] 胡雯, 芮国强. 村社经营统合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经营的利益协同与再生产 [J]. 现代经济探讨, 2024(11):122-132.
- [11] 胡雯, 周义程. 统合式经营: 乡村振兴新内生发展的实践转向与进阶机制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3):20-29.
- [12] 张磊, 郝连儒. 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内在依据与实践路径 [J].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2025(12):57-62.
- [13] 潘珣.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队伍建设的理论机制、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1):104-114.
- [14] 袁建雄. 数字时代青年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困境与进路 [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10):127-133.
- [15] 彭小兵, 谢蕊西. 资本嵌入与文化共生的乡村振兴动力机制——以江西省 S 村为例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3):151-159.

- [16] 程勇, 赵清. 资源获取视角下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研究 [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5(11):32-42.
- [17] 彭小兵, 彭洋. “参与-反馈-响应”行动逻辑下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展路径研究——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3):420-428.
- [18] 吴映雪. 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1):23-33.
- [19] 张应青, 邹梦阳, 许薇.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集群式”协同创新模式、利益联结机制与激励机制 [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5(6):56-61.
- [20] 李雯骐. 从自治走向共治: 新时代“乡村共同体”的理论建构 [J]. 城市规划, 2023(4):93-100.
- [21] 钱全, 尹琳. 乡村地利博弈中情感治理的实践基础与运作机制 [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4):26-34.
- [22] 高威威, 姚云云, 东波. 农村征迁中的双重张力与情感共同体建构 [J]. 东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1):69-76.
- [23] 李梦娜. 社会资本嵌入: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重建的新思路 [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19(4):54-62.
- [24] 李全利. 从场域形塑到行为共生: “场域-惯习”下的驻村干部治理转型——基于广西凌云县的跨度案例分析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115-130.
- [25] 武晋, 祝云凤. 谁来兴村: 乡村振兴主体创新的实践过程与机制研究——以云南省“乡村 CEO”政策实践为例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1):70-79.
- [26] 武晋, 祝云凤.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村庄经营的路径研究——乡村 CEO 整村经营的案例分析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6(1):89-101.
- [27] 陈雯, 陈诚, 高金龙. 迈向知识驱动的乡村新内生发展 [J]. 地理学报, 2025(2):259-271.

引用本文 王妙妙, 姚军. 基于“政社村共同体”视角的产业-人才-文化-组织耦合发展的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J].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2026, 8(1):39-50.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104>.

Cite This Article Miaomiao WANG, Jun YAO. (2026).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Coupl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alent,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ment-Society-Village Communit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8(1):39-50.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104>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Coupl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alent,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ment-Society-Village Community”

Miaomiao WANG^{1,2}, Jun YAO^{1,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Research Center for Urb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of 2026 explicitly sets the goal of advanc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aking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the primary lever, and focusing on enhancing the levels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ment-Society-Village Commun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our-dimensional coupling” of industry, talent,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with a focus

on the practi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where the four systems achieve dynamic balance and synergistic evolution through the continuous exchange of material, energy, and informa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field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volving multiple actors. This coupling relationship manifests as a progressive three-stage process: evolving from the initial “physical superposition” stage, transitioning through “chemical bonding,” and ultimately advancing towards the mature form of “biological symbiosis.”

keywords Government-Society-Village Community;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Coupled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责任编辑：孙强 Email: cpcl@cpcl.hk〕